

孟祥才 胡新生 著

齐鲁思想文化史

从地域文化到主流文化

先秦秦汉卷

山东大学出版社

齐鲁思想文化史

(先秦秦汉卷)

——从地域文化到主流文化

孟祥才 胡新生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齐鲁思想文化史：从地域文化到主流文化/孟祥才，
胡新生著. —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7

ISBN 7-5607-2361-6

I. 齐…

II. ①孟…②胡…

III. ①文化史-山东省-先秦时代②文化史-山东省-秦汉时代

IV. K29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51600 号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 邮政编码：250100)

山 东 省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莱芜市圣龙印务书刊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21.75 印张 564 千字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200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200 册

定价：38.0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序

当“人猿相揖别”的巨变悄悄发生后，中华文明一体多元的格局就逐渐形成。各个地域或同时或次第绽开的文明之花，逐渐发展成内容与形式各有异同的面积较小的地域文化。这些地域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地碰撞、融合，又逐渐汇流成囊括较大地域的文化系统。夏、商、西周以后，经过春秋战国五个半世纪的发展，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形成了十数个具有丰富内涵、相对稳定的地域文化。如河北地区的燕赵文化，山西的三晋文化，内蒙古地区的草原文化，山东的齐鲁文化，河南为中心的中原文化，陕西的三秦文化，甘肃的甘陇文化，四川、云南的巴蜀滇文化，两湖的楚文化，两广的岭南文化，江苏、浙江的吴越文化等，这些地域文化同中有异，异中见同，多姿多彩，争奇斗艳，为中华文明一体多元格局的形成作出了各自的独特贡献。在这些地域文化中，只有齐鲁文化经过先秦两汉时期的发展，完成了由地域文化向主流文化的转变。其他地域文化只是作为文化的因子融入了主流文化。这其中的奥秘是值得认真求索的。

—

齐鲁文化发轫于东夷文化。四五十万年前的齐鲁大地，气候温和，雨量充沛，绵亘于中部、自西向东迤逦展开的泰山、蒙

山、鲁山、沂山和胶东半岛的丘陵，生长着茂密的森林，是采集和狩猎的理想之地。鲁西、鲁北的大平原上，河湖纵横、土壤肥沃，特别适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泰山、沂山、蒙山之南，沂河、沭河、泗水等河渠缓缓南流，带来舟楫之利。而绵长的海岸线又给渔、盐之业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所有这一切，就为最早人类的生存准备了较适宜的环境。远在四五十万年以前，当北京猿人在周口店一带点燃文明之火的时候，东夷人的直系祖先沂源猿人也在沂山的洞穴中出没，面对群山树海，开始了走向文明的艰难跋涉。从原始社会至夏商时期，齐鲁的东夷人逐渐形成了两个文化中心。在泰山以北，以今之淄博为中心，是爽鸠氏、季荊、有逢伯陵和蒲姑氏等活动的地域。泰山以南，以今之曲阜为中心，是少昊、蚩尤、颛顼、后羿、奄国等部落和方国的居地，同时又是与中原文化和南方文化联系紧密、便于交融的地区，因而有极其丰厚的文化积淀。距今 6000 年左右，齐鲁的原始居民进入新石器时代，他们被统称为“夷”或“东夷”。《后汉书·东夷列传》所记载的“畎夷、于夷、方夷、黄夷、赤夷、白夷、玄夷、风夷、阳夷”等，是他们中的不同支系。大约从距今 5000 年到公元前 21 世纪的夏代，东夷族先后出现过太皞氏、少皞氏、蚩尤、颛顼、皋陶、伯益、虞舜、契等传说中的重要部落的首领。与他们相对应的考古文化大汶口文化与龙山文化，以十分丰富的考古资料与传说相印证。大汶口文化与龙山文化的考古资料，除了展示东夷人的灵魂不灭、图腾崇拜、祖先崇拜与其他各种鬼神崇拜这些原始人共有的观念之外，还有对鸟、太阳和桑树这些独特事物的崇拜。与此相联系，礼制的雏形如仪式、伦理和等级以及相应的观念也在这里产生了。后来，齐鲁文化重礼的传统与东夷文化显然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与社会分工的发展，东夷人中产生了专门从事文化活动的巫、巫史、祭司、医生、天文学家和艺术家。在

大汶口与龙山文化的遗址中都出土了占卜用的龟甲。相传颛顼氏任命的“绝地天通”的重黎就属于巫史之类的神职人员。少皞部落中担任“历正”的凤鸟氏，尧时代的羲、和等，显然是一批天文学家，他们能够观象授时，并且知道划分四季了。与此同时，作为记录工具的文字也发明出来，大汶口出土的陶文应是中国较早的象形文字，还可能是甲骨文与金文的先驱。

大量的考古资料表明，在原始社会时期，东夷文化是当时中国境内较先进的文化之一。但是，夏朝建立以后，东夷文化由于缺乏强有力的经济政治力量的支撑而逐步丧失了其优越地位。东夷文化于是在强大的夏文化的冲击下开始发生变异。其相对应的文化遗存为岳石文化，这一文化遗存展示的变异表现为对夏文化的吸收和向夏文化的靠拢。商朝代夏朝成为中原王朝以后，东夷文化又向商文化靠拢，融合则更进一步。因为商人原本是起源于东方的东夷人的一支，在文化上与东夷人有着共源的关系。在夏商时期千余年的历程中，东夷文化虽然不够张扬与辉煌，但由于它对夏商文化的广泛吸收，大大增强了与中原文化的联系，形成了蒲姑与商奄两大文明中心。西周以后，正是从这里生发出光耀千古的齐鲁文化。

二

西周初年，通过大分封在今山东地区建立了齐鲁两大诸侯国，标志着齐鲁文化区域的初步建立。西周时期的齐鲁文化是一种以周文化为主导，融合了夏商文化与东夷文化的个性鲜明的地域文化。这一文化系统是以齐文化与鲁文化两个亚文化系统组成的。

齐国的建立者是周朝的异姓贵族姜尚。他所在的氏族本是东夷人的一支，因而极易与东夷人找到文化上的认同。他在齐国奉行“因其俗，简其礼”和“举贤尚功”的治国方针，铸就了齐文

化重实效、崇功利、举贤才、尚法治、扬兵学、倡开放的文化品格。春秋时期，管仲相齐桓公，高举“尊王攘夷”的旗帜，“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将齐桓公推向五霸之首的尊位。同时，继续弘扬齐学的优长，在思想文化上也有着卓越的建树。他以“水本原论”展示朴素唯物论的自然观，以“顺民心”和“上功富民”的政治学说展示民本意识，而“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则反映了他的礼治思想和伦理观念。此外，管仲在法律、军事和外交思想方面也有许多创见，大大拓展了齐学的领域，深化了它的内容。管仲之后百余年的春秋晚期，齐国又出现了一个影响很大的政论家与思想家晏婴。他个人崇尚节俭，深自谦抑，提倡礼制，强调德化，要求维护君臣父子夫妇以及各色人之间的等级秩序，同时要求关心百姓疾苦，减轻对他们的剥削。在哲学上他主张“和而不同”，批判神道迷信，显示了浓重的人文主义色彩。他的思想进一步丰富了齐学的内容。

在齐文化迅速发展并向四方传播之时，泰山之阳的鲁国孕育发展了颇具特色的礼乐文化。鲁国是周武王之弟周公旦的封国，而这位周公正是在武王之后周王室的实际当国者和“制礼作乐”的创始者，这样，鲁国就成为周文化在东方的最大的继承者和传播者。因周公主政王室，他的儿子伯禽奉命代父经营鲁国。他除了分得卫、唐两国都有的旗鼓一类军事仪仗品外，还特别分得了“祝宗卜史”等专职文化官员和“备物典册”等与礼仪相关的礼器和文物典籍，所以春秋时期吴国季札访鲁时才有“周礼尽在鲁矣”的慨叹。正因为如此，所以鲁文化一开始就显现与齐文化不同的风格。它极力维护宗周文化的纯正性，特别讲究道德名节，注重研究传统文献和阐发宗法伦理观念。正是这样的文化传统与文化氛围，孕育了儒家和它的伟大创始人孔子。

春秋时期，随着周王室的衰微、公室沦落和贵族间斗争的日趋激烈，奴隶主贵族政权对文化的控制力日益削弱，在“礼崩乐

坏”的大背景下，文化下移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原来由周王室和诸侯国豢养的专职文化人，为了谋生不得不投靠发了家的低级贵族，或沦落为民间的自由知识分子。如此一来，一方面促成了私学的勃兴和受教育人数的增加，一方面使传统文化学术成果得以较广泛地传播。这种形势为孔子这样的没落的贵族后裔脱颖而出成为思想文化领袖创造了条件。孔子以仁学与礼学交融互补，构筑他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一方面，他大力提倡以重礼乐、倡教化、明等级为主要内容的礼学，同时又极力弘扬以血缘亲情为基础的“爱人”、“立人”、“达人”的人文精神，强调人的道德自觉和主动求善的内动自律，推出很高境界的道德理想与人格理想。而他的天命观与鬼神论则充满了昂扬向上的主观能动精神。他对中国的古代文献《易》、《礼》、《诗》、《书》、《乐》、《春秋》等典籍的整理，不仅为保存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立下不世之功，而且为儒家学派选定了最基本的思想资料，加上他创办私学，从事教育活动，吸引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弟子，就使他顺理成章地成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生前广收门徒，周游列国，使其学说传播到齐国、宋国、卫国、郑国以及南方的吴、楚等国。在他死后，众多的儒家后学进一步使他的学说在更大范围内播扬，不仅使儒学日益成为引人瞩目的显学，而且为战国百家争鸣思潮的勃兴起了“金鸡一鸣天下晓”的作用。特别是，鲁文化与齐文化一开始就进行频繁的交流，增强了相互之间的渗透与融会，展示了两种具有紧密亲缘关系的亚文化之间异旨互补的特征。由于孔子站在前所未有的理论高度上将传统的政治与道德思想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因而给齐鲁文化注入了新的灵魂。有了儒家学说，齐鲁文化才真正具有了民族、地域的超越性，才真正能够担负起领导中国文化的历史使命。

三

战国时代是齐鲁文化的发皇期，此一时期，齐国的田氏取代姜氏，标志了封建制取代了奴隶制。齐威王厉行改革，使齐国一直是经济与军事力量举足轻重的东方大国。齐威王、齐宣王又特别礼贤下士，建造了规模宏大的稷下学宫，以崇高的礼遇，优渥的物质待遇，吸收大批列国学者前来进行讲学与研究，使齐国一时成为整个中国的思想文化中心。百家争鸣中不少顶尖的学者，如孟子、荀子、宋钐、尹文、淳于髡、彭蒙、慎到、接子、田骈、季真、接予、环渊、邹奭、兒说、田巴等，都曾在稷下的讲坛上留下他们的足迹，为稷下学的繁荣作出了他们创造性的贡献。与此同时，鲁国尽管在经济与政治上日趋式微，但在思想文化上仍然有着骄人的巨大建树。墨子、众多的孔门弟子以及建立思孟学派的两大思想家子思和孟子，都是在鲁国的土地上出生和成长的。反观其他地域，除了三晋地区活跃着一批法家代表人物，如商鞅、申不害、韩非外，还有老子道学的传人庄周北上，在宋鲁边境闭户著书，其余的地域文化虽然也在发展，但都没有产生出足以与齐鲁文化相伯仲的思想巨人。

战国时期齐鲁文化的最大成就是造就了墨家学派、儒家思孟学派、荀子学派、稷下黄老学派、邹衍的阴阳五行学派，以及吴起、孙臧的兵学，并以比春秋时期更大的规模和更快的速度向全国播扬。

墨翟是鲁国（今山东滕州）人，他创立的墨家学派从儒学脱胎而出又与儒学相颉颃。墨子代表“农与工肆之人”，既反映他们的理想也反映他们的局限。他主张“兼爱”、“非攻”，追求“爱无等差”的普遍的人类之爱。他主张“尚同”、“尚贤”，要求各级执政者都是德才兼备的圣贤之人，在此前提下，下级必须逐级与上级保持一致，“上同而下不比”。他还主张“非命”、“非

乐”、“节用”、“节葬”，反对天命，崇尚强力，要求整个社会生活都向劳动者的最低标准看齐，认为衣食住行之外的其他消费都是不必要的浪费。墨子也倡导“尊天”、“事鬼”，显示了他对鬼神迷信的痴迷。墨子提出了著名的“三表法”，显示了唯物论经验论的倾向。墨子的思想，特别是其中“尚同”、“尚贤”的理念，成为汉代董仲舒构筑其新儒学的重要思想资料。

战国时代的齐鲁儒学发展成具有重大影响的显学。孟氏之儒与孙氏之儒都是在这里发展为成熟的思想体系。子思与孟子创建了影响深远的思孟学派，对宋明理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子思是孔子思想连接孟子思想的桥梁。郭店楚简，《大学》、《中庸》等文献，展示了他的“天道性命”、“正心诚意”以及从“正身”、“导民”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全套理论。孟子宣扬“性善”，倡导“仁政”，主张“民贵君轻”，要求“制民恒产”，“五亩之宅，树之以桑，百亩之田，勿夺其时”。他还鼓吹“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价值观念产生了重大影响。荀子创建的孙氏之儒与孟氏之儒虽然隐隐相对立，但对礼教与德化等的认识基本一致。他的“天论”集先秦唯物论之大成，其“礼论”集先秦礼学之大成。他以舟水喻君民关系，援法入儒，主张礼法兼容，德刑并用，大大拓展了儒学的施政空间，为董仲舒的新儒学提供了最切近实用的思想资料。谭嗣同认为“二千年之政，秦政也；二千年之学，荀学也”，应是比较贴近事实的评论。孟子与荀子不仅大大丰富了儒学的内容，完善了儒学的体系，而且在更大的范围内传播了儒家的学说和扩大了这一学派的影响。孟子之见梁惠王，荀子之莅赵访秦，客观上都在播扬儒学。在稷下之学中，黄老之学是以不同于老庄道家的面貌出现的新道家。他们的思想凝结在《管子》一书的一些篇章中。黄老之学有一个唯物论的世界观，它主张“君道无为”而不否认尊君，倡导德治用贤同时重视

刑法的作用，而在“无为而治”的大前提下，强调减轻对百姓的剥削，为之营造一个宽松的生产和生活的环境。它在汉初被统治者选中而能居庙堂之高，实在是渊源有自。

稷下学派的邹衍创建了阴阳学派，他将商周以来的阴阳五行学说加以综合改造，将五行相生五行相胜的理念引入社会历史领域，以五德之运诠释王朝的更迭。他还创造了大九州、小九州的观念，扩大了中国人关于世界的视野。他的理论也成为董仲舒构筑其新儒学体系的最重要的思想资料。另外，在稷下学者中，还有法家、名家、兵家等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都为丰富和发展齐鲁思想文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还应该指出：此期的齐文化与鲁文化一方面弘扬原有传统并继续发展；另一方面，两种亚文化的交流、融会、整合以比春秋时期更快的速度进行。特别是孟子、荀子等儒家重量级人物加盟稷下之学以及黄老学派的创建，更进一步加快了齐文化与鲁文化融合的步伐。可以说，齐鲁文化在战国时期的发展与整合，为汉代齐鲁文化跃升为主流文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

短命的秦皇朝在文化上最大的贡献是统一了文字，使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有了一个统一的交流的工具，对维护中国长时期的政治上的统一和思想文化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不过，由于秦皇朝实行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专制主义的文化政策，窒息了战国时期学术上的百家争鸣思潮。特别是，在李斯的运作下，秦皇朝以一次野蛮的“焚书坑儒”斩断了大多数知识分子与秦皇朝感情的思缕。此时的齐鲁知识分子，包括各学派的代表人物，已参加秦政权者，如叔孙通等开始与之离异，部分人如孔鲋等还投入了反秦的农民起义军，还有相当多的儒生继续在民间聚徒讲学，传授儒家经典，为延续发展齐鲁之学作出了贡献。西汉

初年，禁网疏阔，言论环境较为宽松，因而诸子余绪一度活跃，除墨家之外的不少学派都有代表人物出来活动。被司马迁誉为“汉家儒宗”的叔孙通通过为刘邦制定朝仪使之从实用的层面上认识了儒学的价值，因而有他晚年去孔子灵前以太牢之礼祭祀圣人的壮举。刘邦死后，惠帝、吕后、文帝、景帝时期，黄老思想成为当国者的指导思想。如上所述，此一思想恰恰是稷下之学的一个流派。黄老思想进入汉帝国的庙堂尽管是汉统治者的自觉选择，但并没有通过教育手段有意识地在百姓中灌输这一思想，再加上其他原因，所以这一思想没有在百姓中扎根，其影响主要在国家的高级执政者阶层。

黄老思想尽管适应了西汉初年时代与百姓的要求，但是，其“无为而治”的观念与实践，一方面与国力强大后统治者好大喜功的热望相冲突，一方面也加剧了势力坐大后的诸侯王、地方豪强与汉朝廷中央的矛盾。所以，到汉武帝登基时，黄老思想已经对他失去了魅力。他思谋寻找另外一种思想代替黄老之学，恰在此时，经董仲舒改造过的新儒学使他看到了梦寐以求的“逻各斯”。

秦朝统一以后，面对百家争鸣的结束，齐鲁之学面临着全新的形势。每个学术流派为了自己的生存进行整合与改造。经过秦朝和汉初八十余年几代儒家学者的整合、改造、创新，齐鲁儒学发展成为当时势力最大、最具生机的学派，展示了其他任何学派都无法比拟的优势。第一，它拥有一批经过整理的稳定的思想资料，如《易》、《诗》、《书》、《礼》、《春秋》、《论语》、《孟子》、《荀子》等。第二，它拥有一批学识渊博、声望卓著的学者，他们或跻入庙堂做官从政，以自己的学识为统治者服务，如做了汉太常之官的叔孙通之类；或固守学派的营垒，聚徒讲学，全力延续儒学的香火，如伏生、浮丘伯之类；或努力整合，立志创新，对传统儒学进行精心改造，大大扩展了儒学的影响，如董仲舒之

所为。第三，经过春秋、战国、秦朝和西汉初年数百年的传播，齐鲁儒学早已突破地域界限，在黄河上下、大江南北的广大地区播扬，影响日益扩大。第四，经过数代儒家学者的改造创新，特别是经过一位非齐鲁的学者董仲舒大手笔的精心整合，将齐学与鲁学的优长融为一体，儒学于是以全新的面貌出现，赢得了汉武帝的青睐。于是，通过汉武帝与董仲舒的热烈拥抱，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将儒学推上了主流意识的宝座。这其中，太学的建立，经学官学地位的确立，从儒生中选取官吏制度的确立，使儒学的主流意识的地位日益巩固。此后，在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儒学作为主流意识的宝座始终没有动摇。

诚然，在齐鲁大地上孕育成长并蔚为大观的儒学之跃升主流文化的地位，汉武帝以皇帝之尊选定和推行的政策显然起了重要的作用。不过，起关键作用的还是儒学的内容长期满足了社会的需要。

董仲舒改造传统儒学，创立今文经学，开启了儒学神学化、儒家宗教化、孔子教主化的进程，为中国封建社会找到了最为理想的意识形态，对稳定和巩固大一统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起了重要作用，对于形成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心理结构产生了不可估量的积极影响。她既获得了统治者的青睐，又得到被统治者的认同，是中国宗法农业社会最适宜的意识形态。

由于儒学倡导大一统，鼓吹“内诸夏而外夷狄”，反映了中华各族人民对祖国的认同，蕴含着深厚的爱国主义，形成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由于它倡导尊君爱民，鼓吹等级秩序，“说忠孝，道中庸，与民言服从，与君言仁政”，找到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利益的结合点，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乐于接受。特别是它倡导的三纲五常的伦理学说，给封建社会的人际关系罩上一层温情脉脉的纱幕，反映了中国宗法农业社会中君主、臣僚和百姓对伦理道德的认同。儒学具有强烈的民本主义的政治文化意识和博大深广

的人道主义精神。一方面，它要求对百姓实行“仁政”、“德治”，肯定“汤武革命”的历史正当性；一方面又提倡“仁爱”、“立人”、“达人”和“推己及人”，要求以“爱心”和“亲情”建立“友爱”和谐的人际关系。儒学倡导“尽人力而听天命”，“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鼓吹独立不移的大丈夫精神和操守重于生命的品格意识，一贯重视文化教育事业，这一切对中华民族的精英和广大知识分子都具有永恒的吸引力。儒学还具有开放性的学术品格，它从其产生的那天起，就不断从历史和现实中吸纳知识与智慧，不断从异质文化、“夷狄文化”中吸纳知识与智慧，以丰富、充实和发展自己。它不是一个自满自足、僵化封闭的体系，而是一个具有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与时俱进的奋发进取意识的开放性的学派，因而能够在历史的前进运动中不断增强对社会和人生需求的适应能力。还应该指出，儒学同时具有实践性和普及性的品格。它没有故作高深的玄理，也不用晦涩难解的文字。它的政治、经济思想、伦理道德情操、人生价值理念，都是用比较贴近百姓的语言和司空见惯的事物表述的，因而能够通过学校教育和社会上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授，润物细无声般渗透到人们的身心之中，融化到人们的血液之中，变成了民族文化的基因。

反观其他地域文化，燕赵、三晋、中原、三秦，基本上属于法家文化圈，它们之间虽也有地域上的差异，但除了法家学派的人物外，只有赵国出了一个顶尖的儒家学者荀子，而他的思想却是形成于齐鲁，他本人也应归入齐鲁之学。由于法家学说的明显弊端，这些地域文化也就失去了上升为主流文化的可能。岭南、巴蜀滇文化虽然一度辉煌，但它们除了在音乐、美术、舞蹈等艺术门类留下了一批珍品外，在思想领域却没有产生一个可与孔、孟相伯仲的人物与思想，当然就不具备上升为主流文化的资格。楚或曰荆湘是老庄道学的发源地，产生了影响深远的道家学派。

不过，此一学派只能补儒家学派之不足，却不能在建构主流文化时充当盟主或核心的角色。吴、越地区在春秋时曾产生了吴员和范蠡两位谋略家，其中，除范蠡的经济思想具有一定特色外，那里缺乏成体系的包括政治、经济、哲学和伦理的思想，当然也就更谈不到上升为主流文化的问题。

再看先秦以来那些辉煌一时的思想学术流派，尽管各有优长并对中国思想史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但它们本身都存在着许多明显的缺失，如墨家的“简而难尊”，法家的“刻薄寡恩”，“有术易以兴，无术易以亡”，道家的“无为”、“为我”、“出世”，阴阳家的“使人拘而多畏”，名家的“苛察微绕”，“专决于名而失人情”，农家的平均空想等，使它们都不能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对主流文化的诉求。只有经过董仲舒改造过的新儒学，既保留了原始儒学那博大精深的内涵，又有选择地吸收了其他学派的理论和方法，并且基本上消除了原始儒家“博而寡要，劳而少功”的弊端，成为内容最丰富，涉及政治、哲学、经济、伦理、教育等涵盖深广的学说。它由近及远，由小到大，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个人修养与社会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联系在一起，尽量照顾到社会上各个阶级和各个阶层的利益，找到了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利益的结合点，既易于为人们所理解，又具有可操作性，因而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主流文化的核心和主要组成部分，为中华帝国的长期存在、发展和几度辉煌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文化支撑。尽管两千多年来，星转斗移，世事变迁，外来文化数度冲击，但由于儒学有着很强的因应能力，它的地位一直是安如磐石，没有丝毫的动摇。这种情况，直到近代西方殖民主义者东来，“西学东渐”，在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西学冲击下，儒学的颓势才显现出来。这一情况表明，中国古老的封建制度和与这个制度相适应的文化已经面临全面的变革。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史前至夏商时期的东夷文化	(1)
第一节 东夷文化的起源	(2)
第二节 新石器时代的东夷文化	(6)
一、东夷族各部落与山东新石器文化	(7)
二、原始宗教与礼制观念	(17)
三、专职巫史与原始的历史、文字	(26)
第三节 夏商时期的东夷文化	(35)
一、夏代夷、夏文化的融合	(36)
二、商文化在山东地区的发展	(42)
第二章 西周春秋时期的齐鲁思想文化	(47)
第一节 吕尚与齐学的发轫	(49)
一、“因其俗，简其礼”的文化宽容政策	(51)
二、“尊贤上功”的效益意识与功利思想	(55)
三、大力发展工商业的思想	(60)
四、齐国兵学的创始	(63)
五、重视刑罚与法纪的思想	(66)
第二节 周公与鲁国早期文化	(68)
一、“变其俗，革其礼”与“亲亲上恩”	(70)

二、“明德慎罚”的德治思想·····	(75)
三、鲁国早期礼乐文化·····	(84)
第三节 齐学初现辉煌——从管仲到晏婴·····	(92)
一、管仲的“水本原”论·····	(95)
二、管仲的“顺民心”思想与“四维”学说·····	(99)
三、管仲的“富民”主张·····	(105)
四、管仲的法律思想、军事思想和外交思想·····	(110)
五、晏婴的思想特色·····	(115)
第四节 儒学的初创与播扬——孔子及其弟子·····	(123)
一、孔子的礼学与仁学·····	(126)
二、孔子的天命观与鬼神观·····	(139)
三、孔子整理古代文献及其意义·····	(144)
四、儒学的宗旨与基本特征·····	(153)
五、孔门弟子对儒学的发展和传播·····	(157)
第五节 春秋后期的齐国兵学与《孙子兵法》·····	(163)
一、司马穰苴与《司马法》·····	(164)
二、孙武与《孙子兵法》·····	(175)
第六节 教育与科技·····	(186)
一、西周春秋时期齐鲁地区的教育·····	(186)
二、鲁班与扁鹊·····	(191)
第三章 战国时期的齐鲁文化·····	(195)
第一节 墨学的崛起·····	(197)
一、墨学的思想文化渊源·····	(199)
二、墨子的十项主张及其思想特色·····	(205)
三、墨子重经验重实用的认识论·····	(216)
四、后期墨家对墨子思想的发展·····	(219)
五、墨学由盛转衰及其历史影响·····	(225)